百年记忆容子自传（五）4

广州。茶楼主要是饮茶和吃点心的地方，并不会有其他菜式供应。　香港开埠初期，茶楼、酒楼分为两行业，先有茶楼，后又酒楼。茶楼先於酒楼，皆因商貿未发达，茶楼就像餐厅，很多受薪者和商贩去茶楼饱肚。　由20世纪初期起，酒楼开始兼營了茶楼的业务，而单纯提供点心的茶楼则被逐漸淘汰。茶客去茶楼喝茶有“一盅两件”的说法，“一盅”指的是一杯茶，“两件”指的是两笼点心，描述的是茶客去茶楼喝早茶，一杯茶，两笼点心，一份报纸，便可在茶楼度过一个悠闲慵懒的早上。）

细姑和细姑丈最后一次来时已隔了两个月，和上次一样带我和哥哥出门，买新衣裤，上茶楼，还到相馆合照，拍照时细姑坐着，细姑丈站在细姑后面，躬着身体用手扶着细姑两肩，哥哥站在细姑丈身旁，我则斜斜地被细姑抱着，多温暖的一张照片啊！（最遗憾这张照片，我们母子到了印尼起初还保存着，几次搬迁竟然遗失，翻箱倒箧也找不到。）

2

后来知道三姑和细姑同父异母，细姑的亲母是澳门土生葡萄牙人。那年代即便是土生葡萄牙人也比华人“高尚”，能娶到细姑母亲足见这个华族男人在社会有一定地位。“混血女人难怪有这样漂亮的肤色和脸孔”（这是我稍为长大后想到的）。细姑丈是新加坡商人，到香港时才跟细姑在一块。自从那次一同拍照之后，直到我们搭轮离开香港九龙三姑，再也没有见到细姑和细姑丈，讯息杳无。而今我鬓发已白仍然想念他们，想念被收容那一段日子，落难没有受到半点嫌弃，总希望她和细姑丈还健在，美满地健在。

我们住的出租楼和别的楼一样都有栏干，晒衣服就是把竹竿从栏干伸出去，衣服晾在上面。我们住的2楼不算最高，但往下望，仍然令人心惊胆跳，所看到的来往人群都小得多。所以大人们屡次警告，有次我坐在小板凳隔着栏干看街景，也受到母亲训斥。我和同楼几个玩伴毕竟还是童年，有时玩“疯”了，忘了栏干这块禁地。那时哥哥也只12岁，但是他比我们几个懂事得多，脑袋还从老师那儿装了很多故事，每当哥哥看到这种情景，加以阻止，阻止不来便答应给我们讲故事。哥哥讲的故事有些是我从老师三公讲课时听过的，尽管如此，再听也很感兴趣。这次哥哥讲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：

当年尖沙咀钟楼铜钟

“我们中国，古时有一个很出名的书法家，名字叫王羲之，他的书法天下出名，很值钱，由于他不贪钱不轻易给人写字。有一天，王羲之在路上遇见了一位贫苦的老婆婆，提着一篮竹扇在集市旁叫卖，却没有什么人来买。他看到后心里很感同情，于是就帮老婆婆在每把扇子上都题上字。人们知道后纷纷围拢来抢着购买，一篮子竹扇很快被抢购一空。等着买米下锅的老婆婆非常高兴，十分感谢乐于助人的大书法家．．．．．．”几个同伴在听了哥哥讲的故事后，都很着迷。

“书法家真好心！”一个同伴说。

“怎样学书法，容易学吗？”一个同伴这样问。

书法是中国的国粹，几位同伴对中国书法竟是这样陌生，一无所知。不禁又想起老师三公，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认真而流畅的身影，这个身影后来在梦里也经常出现。我在执笔写这段回忆，不禁喃喃自语“先生，你该配付眼镜了！”老师三公于1970年去世，他戴的那付眼镜眼框，挂在耳朵的挂勾断了用细线梆住，他并不在乎，仍然专心忘我地讲述唐诗，讲述历史故事，教我们语文算术，教我们做人做事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启蒙老师像严父、课堂是一座知识宝藏，我们在老师严格教诲中逐渐成长，在课堂里贪心地夺取知识。

九龙城虽然也缺水，但不像澳门缺水那么严重。在我们母子还没有到来之前，三姑出租楼的饮用水，是限时得到配给供应？还是向人买水用？我没有任何印象。只知道母亲常带水桶到附近的自来水站排队。水站有摩罗差维持秩序，（大英帝国时期，英国从印度招募不少当地人投入军队服务，后来这些印度军人被调派至香港，转而投入警队服务，是故印度及巴基斯坦籍贯差役被俗称为摩罗差，或阿义。）我亲眼看到，摩罗差挥着胶棒逢人便打逢桶便踢，当地居民毫无民族尊严可言。有次，母亲天未亮就带水桶到水站排队，排水队缓缓向前移动，突然走来摩罗差把母亲的水桶踢掉，擅自放了另一个水桶，诬称母亲不守秩序，幸亏母亲眼快避开狠狠挥来的胶棒。此情此景，深烙脑际，虽经岁月，仍未忘记。

（注：今天香港早已回归祖国怀抱，一国两制成为特区，民族尊严已经拾回，特区繁荣有目共睹。奉告一小撮港独份子，也许你们不懂历史，没有经历国破家亡的痛苦，以致盲目听从西方一些反华媒体煽动，应回头是岸，共同为振兴中华民族百年梦继续奋斗！）

3

母亲最焦虑的是父亲有没有从海外汇款，母亲每隔三四天就到旺角街区边缘一间“容氏木行”去问（父亲的汇款是通过这间木行转收的）。每次出门，母亲一定带上我和哥哥，从尖沙咀到旺角，对习惯走山路乡下人来说不算远，走路转几个街角就到。木行开在街区边缘的一块空地上，四周围用一些长短不一木条钉上就算围墙了。围墙里头有一间简陋的房子，屋檐下放着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，就是办公地方。房子旁搭了个约3米高用来锯木的架子，一人站上面一人坐地上，上下来回拉锯，木屑飞溅。围墙内地上躺着几条大圆木，以及东一堆西一堆锯好的木板木条，这些木板木条有的是家具店买了圆木代锯的，有的是木匠根据需要来买的。举目所见，就是木行的整个家档了。

木行屋里挂着一幅油画，油画上画的是一棵老榕树，这幅画一定是家乡哪位叔叔画的，不然不会跟家乡里的老榕树那么像，连榕树吊着的细须粗须都像。画里还用毛笔写了诗句：“洋美榕树三百年，保佑乡民千家园。长须益寿年年多，外出賺钱多多愿。”果然是乡下的榕树，画得那么像，许多村民就是在这棵老榕树下聊天。榕树似乎还认得我，须根动了动在向将要远行的小孙子祝福。哥哥也在凝望着画中榕树，这就是乡愁吗？那时我年小不懂，哥哥应该懂，哥哥眼里微微闪着的泪光告诉了我。

榕树，一粒种子、一段树枝、一截断根，只要是榕树的，在泥地里、在沙土上、甚至在石崖的缝隙中，都有可能诞生新的生命。强大的生命力使他既喜欢在温暖潮润的沙质土中成长，又能在缺水少土的贫瘠石隙里郁郁葱葱。榕树容易成活，还因为榕树巨大的树冠，而将其看作一种兼包并蓄、有容乃大的象征。榕树除了生命力很强外，寿命也是非常长，被称为“不死树”，如果不是被砍伐，榕树可以存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，据说阳朔有一株隋朝所植的大榕树，至今已1400多年的历史，历经沧桑，盘根错节，老态龙钟，但仍然生机勃勃。

每次母亲刚跨进木行，木行人总是遗憾地轻轻地摇摇头，也许是看到母亲失望无助的样子，有时不免说几句安慰话。我们母子三人坐下，不缺茶水招呼。有一次还请我门吃刚煮熟的番薯，我吃完热腾腾的番薯偷偷的告诉母亲，为什么刚才吃的番薯比在乡下吃的好吃？母亲笑了笑：“在乡下天天吃，吃到厌了，我们有多久没有吃番薯，现在吃起来当然香喷好吃啦。”人在沦落的时候有茶水一杯，犹如风雪夜归人，得到炉火暖暖手，感恩心情实难用语言表达。

我们在三姑处住了4个月，就得到木行来人通知，母亲收到汇款格外兴奋，忙拱手谢菩萨保佑，谢木行乡亲关照。父亲有封来信，木行里的人给母亲念道：“海外非常不景气，找工作非常不容易，船票买后余款俭着用。”信很短，念信的人依然好心地给母亲解释一番。

三姑住的尖沙咀当然比容氏木行所在地旺角热闹得多，尖沙咀靠海拥有天星码头，要到大港必须从这里搭渡轮，码头人杂声音杂，这里更是小贩的天堂（注：位于香港中环的渡轮码头,经常简称作尖沙咀码头，之前则称九龙角天星码头。码头提供来往尖沙咀天星码头及红磡码头的渡轮服务，是中环码头的一部分。中环天星码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，现时提供该服务的码头为中环7号码头及中环8号码头。而原本提供该服务的码头则为已拆卸的爱丁堡广场码头。）

尖沙咀还有火车站钟楼，它周围也很热闹。据说自从九广铁路香港段於1910年10月1日通车后，尖沙咀火车站於1913年动工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从英国运来所需物料，车站内部工程一度暂停。钟楼作为火车站的一部分，於1915年完工，整座车站则於1916年3月28日竣工。

母亲经常带我们从附近经过，所以我对钟楼并不陌生，而钟楼，也见证我们母子三人彳亍街头落魄疲惫的脚步。旺角街道相对地古老，店铺相对地传统，母亲喜欢在神龛店前停留一阵，那儿的饼店更吸引我，但是无论任何街景，任何食品，都比不上我对地处荒凉的那间木行印象深刻，是它伸出援手把父亲的汇款交到母亲手上，是它让我们在沦落中看到火把、感受人间温情。

我们寄宿三姑二楼，三姑时常很早就出门，先到茶楼吃了点心，然后约牌友打麻将，直到晚上才回来，有时澈夜不归。所以母亲替三姑整洁家务后，就带我们“测量”街头，“点算”商店。饿了就买个下架咸面包。

等候又等候，1938年底我们终于买到开往印尼“芝加连加”号邮船船票。邮轮什么时候才抵达，我们只好等候又等候。在将要离开香港，我童年的心情竟然变得复杂起来，想得很多，从家乡到睦州，水路到达澳门，在九龙找到三姑，喜遇细姑，一路颠簸，前路茫茫，但也一路乡亲情、同胞谊如好风长吟。善脸慈心三姑，用竹竿从铁栏伸出晒衣服的二楼，特别是细姑和细姑丈，我们仨即便到了天涯海角，也会永远挂念和祝福！